

# Column

## ■大題小議

# 永續發展之道： 概念從模糊到清晰

### ——企業社會責任漫談之一——

●李俊辰

(Jonsson.li@gmail.com)

歐金倫敦投資有限公司  
特約經濟學家和金融投融资  
管理顧問,現居倫敦

隨著中國“限塑令”的生效,商家不得再免費提供塑料購物袋,此外,中國還禁止生產、銷售和使用厚度小於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限塑運動旨在通過改變人們的購物習慣,減少塑料垃圾以及由此造成的“白色污染”,節約能源、改善環境。今年,“綠色奧運”是北京奧運三大理念其中之一,環保的地位可見一斑。中國政府也在積極推進一系列環保政策以及環保項目。中國塑料加工協會估計,實施限塑令之後,中國使用塑料袋的總量將減少三分之一。據估計,中國每天使用30億個塑料袋,需要使用3700萬桶原油加工製造,最後,絕大多數都被扔進垃圾堆填區。

商家的配合非常符合當前世界範圍內“企業社會責任”潮流。

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其概念與實務的發展在近年來似乎逐漸成爲一門顯學。

企業社會責任日益被看成“顯學”,究其緣由或可歸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反全球化聲浪,讓企業領袖、政治人物與國際組織開始正視全球經濟整合的過程中,所可能帶來的不平等現象,以及激化這些不平等所將造成的後果。

企業社會責任的正式定義雖經許多專家學者提出討論,却仍莫衷一是,至今尚無公認的定論。廣義而言,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對社會合乎道德的行為,特別是指企業在經營上須對所有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負責,而不只是對股東(stockholders)負責。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有些人認爲是企業將取之於社會的利益,具體地回饋給社會,亦即社會賦予企業的權利中,亦包括企業應盡的義務,須以社會所能接受的方式履行。有一個類似但較籠統的定義是,企業對於其所依存而運作的社會,負有法律與社會義務,而企業社會責任就是企業和這些義務關係的互動,以及如何履行這些義務。

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曾邀集六十個企業界及非企業界意見團體(6pinion formers)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小區、社會的生活質量。以筆者看來,在這個概念上還應該加上環境保護因素。

企業不應把社會責任暫時還缺乏完整定義當成逃避社會責任的借口。不論有無企業界的合作,社會責任概念的正式定義早晚會產生。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也認識到,因為文化或產業的差異,在實際應用上,企業社會責任的運用會有所不同。

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是繼1992年聯合國里約熱內盧環境會議之後,由當時總部設在日內瓦的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和總部設在巴黎的世界環境工業理事會合併於1995年成立,總部設在日內瓦。理事會主席由會員企業的董事長或總裁輪流擔任,任期一年。理事會日常工作由會長及總部秘書處管理。會長由理事會任命。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是一個與聯合國緊密聯繫的企業會員制組織,現有會員超過140家,有來自全世界30個國家和20多個主要行業大型企業組成,並在全球30多個地區和國家建立區域性的和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作為聯繫網絡,以實現一個共同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即:環境保護,社會平等和經濟發展。

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的宗旨是促進企業、政府和其他有志於可持續發展的社会組織間更緊密的合作,對話和交流,並在此基礎上推動整個社會更加開放和共同富強的進程。具體地說,這些目標包括:促進企業成為提倡和引導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領導性企業、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據並幫助創建一個推動決策實施的框架以保障企業為可持續發展事業隨時獻計策、在會員企業中介紹和演繹最新的企業環境和資源管理的實例以分享最先進的管理和運營理念促進共同發展。通過理事會在全球的聯繫網絡實現全球包括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企業聯合會可持續發展工商委員會(China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於2003年10月成立,其旨在為中外企業提供一個良好的交流合作平台,促進企業、政府和社会組織之間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對話、交流和合作;彼此分享和借鑒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理念、信息、經驗和良好做法,以更好地應對環保、健康、安全、企業社會責任、全球氣候變化等企業面臨的挑戰,通過共同努力實現世界可持續發展。

對中國而言,加強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採用清潔生產工藝,發展環保產業,完善資源和環境管理體系,正視水資源短缺、城市空氣污染、溫室氣體排放、能源和健康等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是需要持續正視的。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與實務的發展,近年來正逐漸成爲一門顯學,廣義而言,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對社會合乎道德的行為。特別是指企業在經營上須對所有的利害關係人負責,而不只是對股東負責。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有些人認爲是企業將取之於社會的利益,具體地回饋給社會,亦即社會賦予企業的權利中,亦包括企業應盡的義務,須以社會所能接受的方式履行。有一個類似但較籠統的定義是,企業對於其所依存而運作的社會,負有法律與社會義務,而企業社會責任就是企業和這些義務關係的互動,以及如何履行這些義務。

## ■內外

# 更多些腳踏實地 更多些差異化

### ——“我看國際金融中心”之四——

●張明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  
與政治研究所博士

在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尚未結束、資本賬戶尚未完全開放、人民幣尚未完全可自由兌換的背景之下,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讓金融與實體經濟更好地匹配,中國可以構建四個層次的金融中心城市:第一梯隊香港、第二梯隊上海與北京、第三梯隊深圳和天津、第四梯隊成都、重慶、西安、鄭州、武漢、大連等區域性金融中心城市。

中國究竟需要幾個國際金融中心,至今仍是個尚未達成共識的問題。然而作為一個幅員遼闊、國民儲蓄率居高不下、投資渠道相對匱乏的國家,構建若干個區域金融中心城市,以更好地打通曾經被阻礙的儲蓄投資轉化機制,更加充分地利用國內富餘資金,更加有效地利用外國資金,這對於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消除地區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筆者認爲,在中國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尚未結束、資本賬戶尚未完全開放、人民幣尚未完全可自由兌換的背景之下,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讓金融與實體經濟更好地匹配,中國政府可以構建四個層次的金融中心城市。

從現實來看,目前位於中國金融中心城市第一梯隊的,只有香港。由於中國內地的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特別是資本項目下的證券投資尚未全面開放,因此,無論上海還是北京,目前都不可能成爲動員全球資金爲全球經濟增長服務的“世界金融平台”。而“一國兩制”的香港,恰好具有京滬不

可替代的優勢。香港資本市場既對全球企業開放,也對全球投資者開放。由於香港金管局實施聯繫匯率制,港幣和美元在固定匯率下可自由兌換,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阻礙國際商品、服務與資本流動的匯率風險。進入21世紀以來,香港聯交所已成爲中國內地企業上市的重要平台之一。據《金融時報》報道,目前在恒生指數10.6萬億港幣的市值中,已有三分之一左右來自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在中國資本賬戶徹底開放之前,香港將持續扮演中國內地與全球自由市場對接的一個平台。人民幣通過與港幣的自由兌換,來間接實現人民幣本身的自由兌換,也許是未來發展的一大趨勢。此外,香港既有着百年以上的資本市場發展歷史以及深厚的人力資源積澱,又通過CEPA與內地建立了更爲緊密的聯繫機制。因此可以預見,在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進程中,香港必將扮演更爲重要的角色。

位於中國金融中心城市第二梯隊的,無疑是上海與北京。這兩個城市目前的定位是,動員國內外資金爲全國經濟增長服務的全國金融中心。上海的核心優勢在於擁有國內最重的一批交易所,交易範圍涵蓋股票、債權、期貨、外匯與銀行間貸款,北京的核心優勢在於擁有一行三會以及一大批金融機構和央企總部。上海的优势在交易與市場,而北京的优势在政策與方向。然而,由於彼此之間缺乏更爲充分的溝通與協作,目前上海與北京也在對方的傳統優勢中相互滲透。上海試圖通過央行二部的建立來复制紐約聯儲模式,將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權納入其中。而北京試圖通過建立石油交易所、全國性知識產權市場以及股權轉讓的OTC市場來淡化上海在市場上的優勢。這種競爭中的相互滲透,將會模糊上海以及北京在金融體系中的定位。

深圳和天津則位於中國金融中心城市的第三梯隊。目前中國經濟有三大大增長板,包括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長三角領域由於上海的存在,已經擠占了其他城市成長爲區域金融中心的空間。環渤海領域雖然有北京,但是

作為政治中心,若干金融業的創新和試點很難首先在北京推行,因此曾經具有驕人金融業發展歷史的天津順理成章地獲得了金融中心的發展前景。深圳對應於珠三角,天津對應於環渤海,兩個城市都有發展爲發達地區的區域性金融中心的潛質。然而,這兩個城市又都不甘心僅僅成爲區域金融中心,畢竟,深圳有着覆蓋全國的股票市場,而天津有着中央特批的金融創新政策。不過,考慮到目前深圳股市的總市值僅爲上海股市總市值的四分之一,而且越來越多的重要企業均首選上海和香港上市,深圳股市的地位將會進一步衰落。即使創業板能及時推出,也很难扭轉這一大趨勢。如果天津的政策優惠不能盡快落實,那麼隨着其他城市陸續獲得類似政策優惠,則天津的“先行先試”優勢可能消失殆盡。

位於中國金融中心城市第四梯隊的,是有可能成爲中國欠發達地區的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幾個二线城市,例如成都、重慶、西安、鄭州、武漢、大連等。成都和重慶都有可能成爲西南地區的金融中心城市,鄭州和武漢都有可能成爲中部省份的金融中心城市,然而一山不容二虎,在構建區域金融中心方面,上述城市之間已經展開了激烈角逐。相对而言,西安和大連面臨的壓力較小,西安有望成爲中國西北部的區域金融中心,而大連有望成爲中國東三省的区域金融中心。不過,所有這些欠發達地区的區域金融中心都面臨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那就是在來自全國金融中心或者發達地區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強大“虹吸效應”下,本地的企業、人才和資金都可能流失。規模越大的企業,越可能選擇到國際市場或者全國市場融通資金。因此,這些區域金融中心更加現實的選擇,是努力成爲本地中小企業融通的平台,以及利用區域內外資金爲本地基礎建設融資的平台。

對中國各大城市而言,在構建金融中心的過程中,腳踏實地地勝过好高騖遠,差異化勝過同質競爭。對政府而言,應儘快出臺并发布一個在中國系統建立多層次金融中心城市的合理規劃。

## ■排沙簡金

# 王石為什麼 會犯“青澀”錯誤

●王育琨

管理專家,  
《經理人》商學院院長

本欄上篇“做企業就是講故事”引發了一些企業家的共鳴,也引來網友的批評。網友說,中國不缺講故事的人才,現在最缺的還是能做故事的人。我同意這位網友的意見。一旦離開做企業的本真,就容易把故事講砸。王石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王石雖然沒有任正非、史玉柱、馬云那樣尽可能多花時間投入到客戶中,但是他把握住了亲和力的密碼,通過登山、社會公益活動,塑造起了萬科在中國獨一無二的品牌。可5月15日晚上,他在電腦上敲下一些令他終生後悔的話,激起的唾沫幾乎要把他淹死:萬科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爲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爲負擔。沒有聚光燈,也沒有人給他做功課,换位思考”,以心比心”,這些都曾經是王石的法寶,卻在那一刻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這一刻,他把故事講砸了。於是萬科股票下跌,員工不滿,社會失望。

罵聲中,王石坐不住了。他奔赴災區,目睹一幅幅慘絕人寰的景象,慚愧地低下了頭。在6月5日的臨時股東會議上,王石說,在這裡我向各位股東無條件道歉,不做任何辯解”;我雖然快60歲了,但對於大事務的處理,還是顯得很青澀。”用“青澀”來形容快逼近花甲的王石,無論如何看上去都不妥當,可細琢磨起來,還真有道理:王石沒有把握現代企業的商业生態。

企業不再是幾個人的牟利機構,而是社會公器。如萬科那樣的有影響力的企業,實際上已成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公共機構。在重大災害面前,萬科和王石的一舉一動,對社會的影響,不下於一個省市或部委。誠可謂,能力越大,道義越重,責任越大。王石不知道,萬科作為最有影響力的公共機構,不能在每一個環節都追逐純粹的利潤,並視其爲正常使命。

沒意識到萬科已是最有影響力的公共機構,也沒有看清楚今天的商业生態,怕是王石的两个“青澀”錯誤。

互聯網的普及和手机短信等信息手段的發達,使得數以億計的人以前人無法想象的方式溝通,企业的商业生态由此而变。以前,也有人扯着标语找万科闹事,但是只要地方政府干预和媒体不曝光,事情很快就过去。而现在在互联网在第一时间能够把王石随意敲下的想法传遍各方。万科有着庞大的预算应对各种传统媒体或公关公司,而面对亿万网民却束手无策。

一手缔造了超级金融企业集团的桑迪·韦尔,醉心于以小吃大。他一直偏爱收购拥有一流品牌的

公司,很少介意纳入一个更有名望品牌整合压力。他承认运气,更坚信那些支撑他做事的十大原则:机会总是埋在危机最深重的时候,一起学习、一起创富,让你的不安全感为你服务,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忌妒好品牌,直觉是培养的不是天生的,要勇敢也要脆弱,着眼大局不放过细节,悲悯心将带来极大的回报。这些看上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简单原则,却使他能够在并购整合的滔天巨浪中信马由缰,创造出花旗集团这样的伟大公司。

当年桑迪·韦尔大意失荆州,将公司卖给美国运通并成为运通公司总裁之后,遭遇了职业生涯中的挫折。他后来总结说,那是栽在了缺乏团队合作、官僚主义和各霸一方的管理文化上。由此,他明白了创建一个以团队为中心的文化的必要性。在组建花旗集团时,“一起学习,一起创富”成了花旗集团的核心价值观。他一面与员工订立“血誓”,使员工广泛持股,高层管理人员持有大部分股票直到退休,一面坚持一种非正式的决策方式,鼓励团队坦率而充满激情地提出问题。由此建立起一种团队文化,管理人员对他们发现的问题负有全责,并负责解决问题。

去年刚刚接任执掌光大金融控股集团的唐双宁,同样对生活哲学有着坚定的信仰。这个当30岁得子时兴奋得不知道干什么就满大街跑的人,脚踏皮鞋,一个人来到光大。他确信,没有没用的人,只有没有用好人才的领导。在他的世界里,哲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问题,当然也可以帮他啃得动光大集团这部天书。

唐双宁也决心要重塑光大文化。真可谓文化如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他看来,业务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是魂。不解决人的问题、魂的问题,根的问题,业务暂时发展了也会反弹,体制改了也不能长久。跟桑迪·韦尔着重于股权激励和决策方式激励不同,唐双宁一双布鞋走网点,更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红楼梦》里“好了歌”那种“忽荣忽枯,忽丽忽朽”的境界,让他看什么都有了一抹灵明。或许,当一个人悟透了生命的意义,就可以回归本原,拥有一双童真的眼睛,保持警醒,就会专注于细节中一刻接一刻的创造了。

桑迪·韦尔和唐双宁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们能用一般生活常识和哲理,把烦闷业务的意义讲解透彻,捕获一大批相关利益者的心。中国企业家想投资经营世界一流品牌,怕是首先要锤炼用生活哲理讲故事的本领。当然还要有点唐双宁式的超脱与自信,且看他的《胸怀》:

“笑大风,潮头立;轻挥手,彤云飞。看涛卷残阳,水吞砥柱。天若不别嫩老天,地若违意抽大地。咫尺世界掌中泥丸,任君戏”。

## ■相望江湖

# 物质性惩罚VS 信用簿登记

### ——“漫走早稻田”之十七——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回国之后,我把本栏上篇Y君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不少朋友和同事听,也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案例详细讲解过。事后,听到有位同事讲了一段提供类似的经历。几年前,他曾经在上午买了一辆自行车,停在小区楼下,中午就被小偷卷走了。无奈之下,不得不下午再去买一辆。不过,更没想到的是,接下去这辆刚买的新车还没有拿到家,就在半路上被偷了。几天后,在回家路上他被一个买旧车的外地小伙子拦住,问他要不要买车。哪里晓得原来兜售的这辆捷安特正是他前些天被偷的。于是,一顿吵闹之后围观上来的一伙人把那个小偷送派出所。没想到,那些民警漫不经心地备了一下案,处罚了1000元之后,就马上把那个小偷放了。一顿愕然之余,他一再告诫我们,一旦遇到这些事情,就自认倒霉,千万别去报案。除了给那些警察增加罚款收入

和案件受理费之外,你还得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备案,一点好处都不会捞到。

很显然,这是一组非常鲜明的制度比较案例。按管理来说,Y君的信用污点并没有任何物质性惩罚,比不上我们对那些小偷的物质性惩罚来得严厉。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似乎恰恰相反。日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偷摸的现象,我们在早大到处可看见那些没上锁的新自行车。而我们近些年为了防止小偷,大家不得不购置高昂的锁具,有时候甚至超过车本身的价值。难道这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因素所导致的吗?我必须承认,这里肯定会有一定的经济发展因素。当中国的经济发到日本的水平,我完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整体素质也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不容回避的一点是,对于偷窃这类犯罪事件的惩治方式不同,本身就有可能影响到

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分叉。这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知识语境中,通常被称为“制度的内生性”。

我们不妨还从制度的本质来解释这一差异及其可能的影响。不可否认,由于警察局对这些事无巨细的小案件具有很高的监督成本,在有限的警力配置下,警察抓住小偷的概率实际上仍是非常小的。或者,由于高昂的技术监督成本,使得警察局实际上不会配置太多的警察。正是这一点,也使得有不少的人抱着侥幸的心理进行偶尔的或者经常性的行窃行为。

在中国对小偷的基于物质性的惩罚机制之下,期望成本就可以用一笔固定的处罚价格来衡量,加上被抓的概率p很小,那么使得期望成本E(C)很容易小于期望收益E(Y),这一内在的制度激励会不断激励小偷的偷窃行为。举个比较通俗易懂的例子,如果小偷被抓住之后的处罚是10000元(应该是很高的处罚,远远比我同事告诉我的数字要高得多),而小偷一个月被抓的概率是0.1,那么期望成本E(C)=10000\*0.1=1000(元)。假如小偷每偷

一辆车的平均所得为100元,那么只要他每个月偷10辆车就可以实现盈亏平衡点。因此,为了抵消他在物质惩罚上的损失,他不得不本本加厉,加大行窃次数,由原来的10次增加到100次,那么此时他的期望收入就变成9000元。这一收入水平应该远远超过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这样又会吸引更多的加入到偷车的行列中来。

再来讨论一下日本社会的信用簿处罚办法。Y君的信用记录记下一次偷车的犯罪污点。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今后的有生之年,只要有人对Y君有兴趣,都可以查到他的这一污点记录。比如,他自己所说的找工作,如果有家单位觉得他之后的研究做得不错,那么他们会去查询他的各种信用记录。一旦发现这一污点记录之后,很有可能会放弃之前的录用意愿。如此算来,即使警察局对这些小偷小摸的小案件监督成本很高,我并不认为日本警察在这方面会有更高的破案率,但只要他偶尔被抓一次,那么所接受的非物质处罚在未来长期的损失却是无穷大的。此时,即使p再小(0.01,0.001,0.0001...都不影响最终结果),只要存在被抓的可能性,那么同样会使他行窃

的期望成本E(C)变得很大,从而很难能超过期望收益E(Y),即期望收益E(Y) < 期望成本E(C),那么小偷不再会有太大的激励去做行窃之事。这也就是说,在有限收益和无限成本之间,不论被抓概率再小,那么小偷仍有可能会放弃行窃这个得不偿失的念头。而Y君之所以会犯下这一傻事,并不是因为他不理性,而可能的原因就是他那位同学评价的那样,他在中国待得太久,很多事情做法都已经变得非常Chinese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第二天他会把重新的放回原处,算不上什么行窃。

以上分析让我们得到一个惊人的,但也比较吻合现实的结论:物质惩罚的执法体系,诱致了那些小偷变本加厉,同时也使得更多的人加入到小偷行列中来。而且,这种物质处罚数额越高,小偷就更有激励加大偷窃次数,社会由此会陷入更加混乱和不安之中。而在一个非物质惩罚,但以未来信用污点作为处罚的执法体系中,无限长期的信誉损失将可以有效遏制小偷的变本加厉,以防社会道德恶化,从而引导社会向一个长期稳定和谐的方向发展。